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山重水复

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陈 平

总体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继续九大的错误路线

仍然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江青集团势力得到加强

虽然十大依然坚持“左”的错误，但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些积极成果仍然保留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山重水复

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陈 平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重水复：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陈平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10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ISBN 978-7-202-06981-3

I. ①山… II. ①陈… III. ①中共十大 (1973) — 史料
IV. ①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161 号

丛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丛 书 主 编	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	刘会军 刘 敏
本 册 书 名	山重水复：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 册 主 编	陈 平
选 题 策 划	马千海
责 任 编 辑	马千海
美 术 编 辑	李 欣
封 面 设 计	红汇·一品
版 式 设 计	宋晓璐
出 版 发 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
字 数	125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981-3/D·691
定 价	26.00 元

|| 目 录

CONTENTS

◎ 大会背景 / 001

“批陈整风”运动 / 002

毛泽东视察南方的谈话 / 008

九一三事件 / 010

稳定局势的措施 / 011

“批林整风”汇报会 / 013

纠“左”的努力及其受挫 / 013

◎ 大会纪实 / 017

大会筹备 / 018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 022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 023

第一项议程：周恩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 024

第二项议程：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025

第三项议程：选举十届中央委员会 / 030



◎ 重要文献 / 03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034

中国共产党章程 / 045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候补委员三百一十九人名单 / 050

◎ 历次全会 / 053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 054

中央政治局新成员简介 / 054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 064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064

◎ 热点聚焦 / 069

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 / 070

周恩来最后一搏 / 075

毛泽东五选接班人真相 / 078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为邓小平的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 088

十大述评 / 09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 107

动乱的再起和围绕四届人大的斗争 / 120



大会背景

- ⑤ “批陈整风”运动
- ⑤ 毛泽东视察南方的谈话
- ⑤ 九一三事件
- ⑤ 稳定局势的措施
- ⑤ “批林整风”汇报会
- ⑤ 纠“左”的努力及其受挫

“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 1971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在外地巡视期间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按：即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是“挖墙角”。“批陈整风”运动最具实际性的内容，是这三项。

一、学习与批判

1970 年 10 月，毛泽东对贵州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11 月 6 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11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阴谋活动，有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在指示中号召全党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全党全军立即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学习与批判。

1970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红旗》杂志 1970 年第 12 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学习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1971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 1970 年 12 月 29 日对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伯达一类骗子。”3月15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写了批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全党全军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结合批判陈伯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报刊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即陈伯达）的浪潮，着重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二、陈伯达罪行的公布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这个材料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如“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这个材料，若干问题符合事实，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陈伯达的真正罪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所列，恰恰没有列出，铺陈了许多不实之辞和本人在历史上交代过的问题。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三、加强与削弱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说，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权力很大，它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决定说：“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这个决定大大加强了江青等人的力量，也就在实际上削弱了林彪一伙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遏制了林彪一伙，却在客观上为江青一伙弄权窃国提供了条件。康生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并非江青一伙，后来调去沈阳，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所以中央组织宣传大权不久就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中央认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事实证明，“山头主义的窝子”云云，并无根据。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党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四、华北会议

1970年12月10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

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说陈伯达反对毛泽东、林彪，都是无稽之谈。“保定问题”极其复杂。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各支持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负责人却是中央所信任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陈伯达，但是毛泽东认为找到了“石头”。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林彪对毛泽东所说，纯系捏造；“太上皇”一说，也非事实。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9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3人。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12月19日，周恩来将18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此件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这一批示也列为华北会议的学习文件。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揭露了陈伯达，

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月26日，郑维山、李雪峰作了检查。

综观华北会议前前后后，从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到郑、李的检讨，既有正确地揭发批判的一面，又有许多不实之处，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掩盖了实事求是。会议文件中说，“陈伯达……反对……林副主席”，“陈伯达投靠……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是肖华、杨、余、傅……的黑后台”，“反革命分子……杨成武”，这类说法都是违反事实的。从根本上说来，中央文革小组倒曾是各地区的“太上皇”，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并未与陈伯达狼狈为奸。

五、“抓住不放”的批判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判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说的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泽东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泽东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所谓“其他宣讲员”，就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路线性”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这样吗”？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泽东指

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道：“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这里显然批评了林彪。（按：毛泽东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已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143人参加的座谈会。从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人参加了华北会议。在军委座谈会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未批陈，也未检讨。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政时期那样”。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时，毛泽东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2月，《外交活动简报》第29期所刊《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4条中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提出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这显然是对林彪一伙篡改党史的批评。

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
问题。”又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
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3月30日，毛泽东在“×××3月19日在河北省
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
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
月19日才讲出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
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
负责人共99人参加。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讲
话。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
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泽东的
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看来批判是严厉的、频繁的。毛泽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路线
问题”，因而“抓住不放”。黄、吴、叶、李、邱揭陈没有多少事情可揭，又
不愿、不敢揭出叶群，恐怕也未必弄清楚了“路线问题”，因而总是过不了关。
尽管毛泽东注意稳住林彪，但是林彪定然心中有数。林彪知道：批陈实质上是
批林。

从以上所述看来，“批陈整风”运动十分复杂，既有正确的方面，更有不正
确的方面，正确与错误混杂。总的说来，要逐步解决问题是正确的，但问题没
有抓准，批陈颇多牵强附会，没有打中要害，若干问题没有正确处理，人为
地制造了纠纷。

毛泽东视察南方的谈话*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一些省视察。一路上，他分
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版。

了多次重要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次南方视察的目的，是要向党内表明，“批陈整风”汇报会并没有解决问题，会上对黄永胜等人的错误所作的结论已经不够了，只批陈伯达而不去触动林彪等人不能解决问题。他希望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认识，了解中央内部的严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细而继续跟林彪走。这些谈话实际上也是为拟定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作准备。

针对林彪等人的种种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他反复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泽东又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又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决定



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如“一好带三好”、做思想工作要“雷厉风行”、轻视军事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批评了林彪让自己的妻子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批评了对林立果的狂热吹捧。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要求只能把他的话传达到当地的一些负责同志，严禁外传。

九一三事件*

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在林彪的指挥下，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冈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

*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special/guoqing/60/2009/06-24/91.shtml>

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悍然决定谋杀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仓皇出逃，结果亡命温都尔汗。

稳定局势的措施*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

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干部群众不明原委，议论纷纷，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随着传达范围的逐步扩大，群众对事件本身的猜测逐渐平息，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议论却明显增多。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宣布：林彪于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9日，中央宣布，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得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9月下旬至10月初，中央相继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

*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为彻底审查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并准备在10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

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主持下，党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愤怒谴责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在这段时间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正确决策。

中央还采取措施，慎重、妥善地对那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中卷入很深的人或单位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空军、海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揭发、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一些原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人趁机浑水摸鱼，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账；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批判和冲击；一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一度又出现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些问题，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在北京分别召集武汉、成都、陕西、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海军等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或在各地区召开当地的工作会议，统一干部认识，调整领导班子，逐步稳定了这些地方的局势。